

论锡伯文和满文的源流关系

余吐肯

(伊犁师范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之一。锡伯语和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满语支。锡伯文是略加修改的满文,是满文的继承和发展。锡伯文和满文具有源流关系,这个历史演变过程是: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老满文——新满文——锡伯文。

关键词:锡伯文;满文;源流关系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6)04—0034—06

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中华民族中有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之一。锡伯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人口约18万余人。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东北的锡伯族通用汉语汉文,而居住在新疆伊犁的锡伯族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满语支。锡伯语同满语在语音、词法、句法、词汇诸方面基本相同或完全一致。书面语的突出特点是,在语音上有元音和谐律,即相同元音出现同一词里和谐适应,且有重音;构词法属粘着语,动词除词根不变外,各种形态变化均可附加中缀或后缀;语法上语序是soy型,即主宾谓。文字属于拼音文字,有121个形体字母,其中有5个元音,18个辅音,10个拼写外来音的字母。字母的基本笔画有字头、齿牙、圈、点、字尾,各种方向不同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书写时,顺序从上到下,行款从左到右,同一个字母出现在不同位置上都有不同的字型,即独立、词首、词中、词尾四种不同形体。

锡伯文的基本字型、拼写规则等等,都不是锡伯人的祖先创制的。锡伯文的基本笔画和书写特点,也不是锡伯文所特有的,而是有其历史演变过程和历史继承性。这个历史演变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老满文——新满文——锡伯文。

粟特(Sogd),是中亚西亚古国,早期活动在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居民属于伊朗语族,主要经营农牧业,约公元前6世纪到5

世纪形成阶级社会和国家。在历史上,突厥各部落首先畏兀尔人在9、10世纪的时候,曾和住在中亚西亚的粟特人其他伊朗支的部落进行过相当长的战争。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使两个部族之间的政治经济相互渗透,而且文化的渗透也十分明显。这一战争是这样结束的:畏兀尔人战胜了粟特人和伊朗支其他部落,并建立了回鹘汗国。畏兀尔人在漠北时期使用的是鲁尼文(runic),用鲁尼文字母拼写突厥语,史称古突厥文。建立回鹘汗国后,国势逐渐强盛,粟特人受汗国统治,大量的粟特人移居汗国境内,畏兀尔人开始利用粟特文记录畏兀尔语,后略加修改老粟特文,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拼写畏兀尔语言的回鹘文。回鹘文字母因年代差异而有所不同,文献中使用较少的为18个,最多的为23个。其中8个元音由5个字母表示,22个辅音由18个字母表示。在早期文献中,一个字母有时表示两个以上的语音,后期才在相应的字母左右加一个点或两个点加以区别。字母分字头、字中、字尾,行款从左到右,书写从上到下竖写。现在回鹘文有碑铭和文献。碑铭中以《九姓回鹘可汗碑》为最久远、最有名;文献中以《乌古斯可汗传说》、《金光明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高昌馆杂字》、《高昌馆来文》等著名。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学者尤斯甫·哈斯哈吉甫的古典叙事长诗《库达德库·比力格》(《Kudatku·Blik》即《福乐智慧》),就是用这种文字写的。这部著作的原本,现存在奥地利维也纳国立图书馆。

伊斯兰教还未巩固加强之前,住在西亚和蒙古

收稿日期:2006—07—05

作者简介:余吐肯,男(锡伯族),伊犁师范学院副教授。

的大多数突厥和蒙古部落使用回鹘文。这一文字当时使用的地区，曾经远达葱岭以西。后畏兀儿人在葱岭以西建立哈喇汗国，地域接近阿拉伯，所以他们首先接触伊斯兰教，10世纪后半叶，伊斯兰教随同哈喇汗国的强盛向东发展进到喀什噶尔，继而传入叶儿羌，又传入和阗，到13世纪初年，畏兀儿人大都改信伊斯兰教了，随之他们用粟特文创制的回鹘文也逐渐被阿拉伯文排挤。回鹘文成为死亡了的历史文字。

11、12世纪时，今蒙古草原上及草原的周围，有大小许多部落，其中有蒙兀儿部（即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斡亦剌部、乃蛮部、翁吉利部、汪古部等。乃蛮部落的首领塔阳汗（Tayancian, Tayag Khan）在1204年，把回鹘文介绍到蒙古西部，乃蛮部落等开始使用回鹘文记录蒙古语。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各部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国，并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时，曾经俘获乃蛮部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Tatatonga），以其尽忠职守，仍命居左右，掌理文书印鉴，教授蒙古诸王贵族子弟以回鹘文，后命用回鹘文拼写成蒙古国书，蒙古人从此使用回鹘文拼写蒙古语言，有了各部落通用的文字。一直到14世纪末为止，官方文件始终使用这一文字，习惯上把它称为“老蒙文”。

蒙古人起初毫不变动地使用了回鹘文，随着喇嘛教传入蒙古草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西藏学者彻基·斡色尔（有的译为却吉·斡斯尔）改进了回鹘文。这位西藏学者因为要把佛经译成蒙文，所以从藏文里借用了5个字母，补充了回鹘文，制定了与回鹘文不同的新书法，使之适合于蒙古语。他于元贞一至大（1295—1311）年间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大德九年（1305）自藏文翻译《入菩提行经》，至大四年（1311）著《释菩提行经》，后为了转译梵文，应用了名为“卡立克”的专用字母，自梵文翻译《五护符》及跋，特别是他所著的蒙古语早期语法著作《蒙文启蒙》，对蒙古文拼写方法作有系统阐述，是其最著名的重要著作。

17世纪，对蒙文作了进一步改进，使之更适合于蒙古语特点，字母中去了那些标记非蒙古语音符号，并且改进了一些字母形式。通过多次改革，至17世纪回鹘文式蒙古文发展为两支：一支是用于卫拉特方言区（清时亦称额鲁特、厄鲁特，分有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对原有蒙古文稍加改进的托忒蒙古文，现仍在新疆的蒙古族中使用；一支是通行于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现行蒙古文，又称“扈杜蒙”蒙文。现行蒙古文有

29个字母，其中24个辅音由24个辅音字母表示，7个元音由5个元音字母表示。多数字母出现在词内位置不同而写法不同，有词首、词中、词尾三种变体，有转写非蒙古语的字母，书写从上到下，行款从左到右。这就是“新蒙文”。

满族的祖先女真人起初也没有自己的文字。女真人强大以后，与邻国交往时一直使用契丹文字。辽天庆五年（1115），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命完彦希尹创制女真文字。完彦希尹受命后，乃“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①。即根据女真族语言特点，仿照汉字楷书，参照契丹字的构造法，创制女真文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制成，金太祖命令颁行。到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又有人制成一种新文字，于皇统五年（1145）颁行。习惯上称这种新字为“小女真字”，而完彦希尹创制的称为“女真大字”。这两种文字同时并用。金亡以后，便在中原绝迹，只有东北少数人使用，明中叶以后渐废。现在流传下来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即明代所编的《华夷译语》^②中的《女真馆来文》、《女真馆杂字》和一些碑刻等等。

15世纪中叶，满族的西邻是蒙古人，蒙古人此时已废弃八思巴文，改用回鹘文为基础创制的蒙文。当时满蒙交往频繁，然而满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用蒙文记录。凡事都须先译成蒙语，然后用蒙文记录。尽管蒙语、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语法相似，有许多相同的同音同义词汇，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语族，一个是蒙语族，一个是通古斯——满语族，把满语译成蒙语再记录，着实有许多不便之处。更何况当时满洲崛起，国势趋强，没有自己的文字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客观要求。于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根据蒙文创制满文。此事记录如下：

“己亥二月，太祖苏勒贝勒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上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何以为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他国之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噶盖对曰：‘以我国之语制字最善，但更制之法臣等未明，故难耳。’太祖曰：‘无难也！阿字下玛字，非阿玛（父）乎？鄂字下墨字，非鄂墨（母）乎？但以蒙古字会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吾意决矣，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

于是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直写右行的满文。初创的满文，没有点圈，字型不固定，和现行有点圈的满文不同，所以习惯上称之为“老满文”。清初自清太祖丁未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 1607 年）起，到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官修史《满文老档》，记载清初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重要历史文献，就是用这种文字记述的。

这种没有点圈的老满文，是完全借用蒙古文写满语的，存在许多缺点，字型复杂，习用不便，且不能准确记录满语。因为在蒙文字母中，a、e 和 o、u 不分，k、g、h 及 t、d 和 z、s 区别也不清楚，且在蒙语中又无 f 音位，用 b 字母来代替时又容易造成 b、f 不分的情况。这样写一个词，有三种读法，因读法不同，词义也截然不同。例如：

ka 字，不仅要读 ka，也可以读为 ga，还可以读为 ha；ta 字，不仅要读 ta，也可以读为 da；ko 字，不仅要读为 ko，也可以读为 go，还可以读为 ho，如此等等。

有些词写得一样，因有几种读法，就包含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词义了。例如：写的是 aka，读为 aka 时，词义为烦恼、忧愁，但 aka 也可以读为 aga（雨），还可以读为 aha（奴隶、奴才）；写的是 toro，也可以读为 doro（礼仪）；写的是 kolo（剥落），也可以读为 golo（河身、省份、脊椎），还可以读为 holo（虚假、山谷、沟）；写的是 eiken，也可以读为 eigen（丈夫），还可以读为 eihen（毛驴）。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在这里不仅读法被混淆，且词义不同，容易出错，甚至笑话百出。一篇文章只能根据头尾，仔细搭配，经过一番推敲，才能读出正确的读音，读出正确的读音，词义才能通达，若无蒙文基础，那就更难了。尤其是单词、单句辨认十分困难，如果遇到人名、地名困难就更大了。为此，清太宗天聪五年（1631）十二月定朝仪，令巴克什达海对老满文进行修改，增加了十二字头。天聪六年（1632）三月，清太宗皇太极谕达海，要进一步修改满文。他上谕称：

“十二字头无识别，上下相同，幼学习之，寻常言语犹易通晓，若人姓名及山川土地无文义可寻，必自舛误。尔审度其字旁加圈点，使音义分明，俾读者易晓。”

在《满文老档》天聪卷中，对此事记录得更加清楚：“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雷同无别。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⑥

达海遵奉旨意，对额尔德尼、噶盖在蒙文基础上创制的老满文进行了改进。他利用字母旁边加圈点，改进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新字母等方法，区别用蒙古字母书写满语时易混之音。例如：

a、e 元音字母，在词中书写时，蒙文均为一个齿牙，达海在满文中改进为 a 字为两个齿牙，e 字为一个齿牙；在蒙文中 o、u 不分，在满文中改进为不带圈点时读 o，带点时读为 u；辅音 k、g、h 与元音 a 拼写时，不带圈点时读 ka，带点时读 ga，带圈时则读为 ha。又如，k、g、h 与元音 e 拼写时，不带圈点读 ke，带点时读为 ge，带圈时则读为 he；与元音 o 拼写时，不带圈点读 ko，带点时读为 go，带圈时则读为 ho 等等。这样，初学者一眼就能读出正确的音来。

此外，当时由于满族和汉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交往日益密切，许多书籍、典章、奏本、官衔名目等需要译成满文；同时，因为满洲人和蒙古人有较长的来往关系，所以喇嘛教在满族地区盛行起来，佛教梵文词语也开始大量进入满语词汇。于是，在十二字头之外，又增添了专门拼写汉语借词和梵语的字母。正如国史馆《达海传》中所记云：“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谓‘旧有十二字头为正，新补为外字，犹不能尽写，则以两字合音为一字，较汉文翻切尤精当’……”在这里所说的“两字合音为一字”，指的是达海为拼写汉语借词而创制的 6 个辅音字母：kca、gca、hca、tcs、dcz、zca，因为不够用，又创制了 4 个特定字母：ts、sy、ccy、jcy。这种经过改进的满文有 6 个元音字母，18 个辅音字母，加上拼写外来词的 10 个特定字母。字母出现在不同位置上都有不同的形体，即独立、词首、词中、词尾。这种满文与无圈点的“老满文”相区别，习惯上称之为“新满文”。

新满文，能比较准确地记录满族语言。清代从此用它书写公文，记叙历史，创作文学作品，翻译汉文书籍，尤其是清朝统治中国后，这种文字曾作为国文，与汉文并用，记录堆积如山的档案文献，成为研究清史、中国近代史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料。当然，改革后的新满文仍未能克服它固有的某些缺陷。它本来是拼音文字，改革时因受时代局限，不能用科学的语音学原理进行音素分析，而是用 6 个元音和 12 字头合成切音字，使字母的形体多达 131 个，只能靠死记硬背来掌握它。此外，这些形体字母在写法和读法上，也有一些不一律的情况。例如：ne、le、se、še、te、de、me、ce、je、ye、fe、ve、re 等字，在写法上用 a 字的形体来拼写，而在读法上却用 e 音来拼读；有些字母用元音 e 字形态

拼写，而在读法上却用元音 a 音来拼读。如：ba、pa、kca、gca、hca 等。

尽管如此，满文在类次音素文字中，还可以称之为较完善的文字。这个文字在三百多年的使用过程中，经过总结和规范，不断臻于完善。尤其在康乾盛世，陆续编纂出版了《大清全书》、《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清文汇书》、《清文补汇》、《清文总汇》等工具书，还出版了《满文十二字头及切音对汉字》、《清文指南》、《清文虚字指南》、《清语要术》、《清语分晓》等书籍。所有这些，为丰富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为满族和锡伯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锡伯族原先也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祖先原居在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自元朝起隶属科尔沁蒙古部。明万历二十一年，九部之战后归附努尔哈赤，随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编入蒙古八旗。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将锡伯从科尔沁抽出编入满洲八旗，分驻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纳（今吉林扶余县）、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等地，隶属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间，又将锡伯族从上述各地一律迁徙，分散到盛京诸城驻防。

有一种说法，锡伯族自从归附满洲编入满洲八旗，迁徙到盛京各地后，失掉了自己原来的语言，而被满语化了，所以锡伯族说的是满语^⑥。这完全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主观武断的推测，违背最起码的历史和语言学常识。古今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论证，锡伯族是古代东胡系鲜卑的后裔。在历史上，鲜卑语与乌桓语相同，而乌桓语又和靺鞨语相近，《旧唐书·室韦传》记载，室韦“其言语靺鞨也”，《新唐书·室韦传》记载，室韦“风俗语言同靺鞨”，室韦是锡伯族的称谓，靺鞨是满族的称谓，所以锡伯语和满语自古就是亲近的语言。按照锡伯语之“满语化”说的观点，锡伯族南迁盛京等地之后，失掉了自己的语言，那么，在科尔沁蒙古统辖时期操什么语呢？史料证明，和现代锡伯族人操的锡伯语基本一致。有两份史料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份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历代八旗杂档》第七包第 233 号《康熙三十八年镶红旗移来锡伯咨行制书馆档》，内载从科尔沁蒙古移入满洲八旗的 24 个锡伯族佐领等官员名单，从这些人名来看，和现代锡伯族的人名基本一致。人名是一个民族语言基本词汇的具体体现，这部分官员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移出科尔沁蒙古，编入满洲八旗的，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到三十八年，只有七年时

间，而且这一部分人还没有到满族生活区域，为什么这些人名词汇和满语相同呢？只有一种解释，这些基本词汇是锡伯族的固有语言，并证明，锡伯语在历史上就和满语相近。别无其他解释。

另一份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档》中有两件珍贵资料：一件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黑龙江副都统阔特虎行文齐齐哈尔协领麻齐，索要通晓满蒙二文的锡伯族翻译，将满文行文翻译为蒙文。该行文道：“为俄罗斯特使骆马倒毙事。送呈理藩院函一封。为驻守蒙古驿站者送文事，所该咨行蒙文，此地无一会者，故草满文底稿，盖印送之，令彼处锡伯中会蒙文者，看满文译成蒙文，送往蒙古驿站，转站传送。为此咨事。”另一件是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时，俄方用蒙语中方用满语谈判，为此康熙三十二年（1694）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行文齐齐哈尔副都统麻布岱，索要通晓蒙语的锡伯马甲二人，充当中方代表的国家翻译。该行文道：“此处有差遣陪俄罗斯特使同往之事。到尼布楚后，与俄罗斯谈判均用蒙古同事等因，希派通晓蒙语之人。查此地无通晓蒙语者，彼处锡伯披甲中，选精通蒙语，将我言告于彼，又将彼语告于我者二人，令带两月食米，与俄罗斯特使一并出发，前来会晤此处所派官员。为此咨事。”

这两份珍贵资料说明什么问题呢？在偌大的黑龙江将军管辖之下的满蒙官员中选不出精通满蒙二语的翻译人才，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移出编入满洲八旗才一两年，却从锡伯披甲中挑选，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的国际谈判中充当翻译，这无可辩驳地证明，锡伯族长期与科尔沁蒙古杂居，通晓蒙语，另一方面当地满族官员清楚，满族和锡伯族之间通话不用翻译，锡伯族的固有语言与满语相同，所以，重要满蒙语言文字的翻译，屡叫锡伯披甲充当。这里还值得思考的是，假如满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进行强迫满语化政策，锡伯族的固有语言与满语不同，那么，与锡伯族处于同一政治历史地位，具有相同地理环境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为什么没有满语化，惟独锡伯族满语化了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满族统治者进行强迫满语化政策，满族人就不会汉语化了。上述资料还证明，锡伯族在科尔沁蒙古时期，最少算也是一百多年，却没有蒙语化，而从康熙四十一年即 1702 年南迁盛京至乾隆二十九年即 1764 年西迁伊犁，总共才 62 年，最多不过 64 年，试想，一个民族的语言无论如何不可能在 60 年之内就会失掉，或者被另一个民族同化。笔者认为，新疆锡伯族至今操用的语言，是锡伯族自古使用的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固有

语言。它和古鲜卑语有某种血肉联系；在历史上，它和女真语是很亲近的；锡伯族被满族征服后，因为满语和锡伯语十分相近或基本相同，所以锡伯族很快学用了满文，并接受了逐步规范化了的满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固有语言；锡伯族西迁后，锡伯语在固有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把满文发展成为锡伯文。

正因为锡伯族的固有语言与满语基本相同，所以从编入满洲八旗起开始习用满文。据查锡伯族开始习用满文当是满文创制 96 年后的康熙三十四年（1695）。史书中记云：“三十四年萨布素（黑龙江将军）奏请墨尔根两翼各立一学，设助教官，选新满洲即锡伯、索伦、达斡尔佐领下幼童一名，教习书艺，是为黑龙江建学始也。”^①

到了乾隆年间，锡伯族的满语满文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二十二日，即锡伯族西迁伊犁六年后，盛京将军恒录巡视南路诸城后奏道：“奴才恒录谨奏，为奏闻巡视南边诸城事。奴才上次奏后，是年七月十五日启程，巡至盖州、熊岳、复州、锦州及旅顺水营……试其官兵满语程度，锡伯皆能通满语，其余虽比过去稍有长进，但不懂者仍居多数。”^②

以上史料证明，锡伯族远在东北的时候，已经通用满文了。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千多名锡伯人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他们的后代——新疆伊犁的锡伯族，一直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固有语言，并把满文发展成为锡伯文。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在 240 年的历史变迁中，为什么能够保持自己的语言，并把满文发展成为锡伯文呢？分析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锡伯族共同生活的经济活动区域是乌孙山下，伊犁河谷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现代文明还没有进入这个区域之前，他们远离内地，经济落后，交通阻塞，基本处于半封闭式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生活在八旗军营制里，八个牛录八个城堡，一个城堡就是一个军营，不准外族人进城居住，更不允许本族人与外族通婚，尽管清朝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中灭亡，可是锡伯族的八旗军营制一直到 1938 年才废除。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尤其是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锡伯族人民当家做主，获得了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这是锡伯族能保持自己语言文字的社会政治和地理原因。

第二，锡伯族迁徙到伊犁后，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开渠垦荒，经济上自给自足，无须外出谋生；就其生产力水平来说，相

对高于周围的少数民族，是伊犁各军营之冠，生产上无须依赖于他人，这种封闭式和半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不注重商品交换，八旗军营制又不允许军民进行经商活动，使驻防西北边疆的这部分锡伯人与世隔绝，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社会环境，在解放前，未受太大的冲击。这是锡伯族能保持自己语言文字的社会经济原因。

第三，锡伯族历来重视文化教育。西迁的锡伯族在清代不仅设有私塾，而且还有官办义学。在近代，在“尚学会”、“兴学会”等群众文化教育团体的促进下，锡伯族群众自筹资金办学校，除了锡伯营总管档房所在地六牛录办有官办高小外，几乎所有的牛录都办学堂，教育的主要内容、手段，课程、教科书，自西迁到解放前，都以满语满文为主，或者用满汉合璧教材。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的文化教育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从内容、质量、数量等诸方面，任何历史时代都无法比拟。至今锡伯族集中居住的乡镇小学，仍在开设锡伯语，教锡伯文。这是锡伯族能保持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原因。

那么，伊犁锡伯族是怎样把满文发展成为锡伯文的呢？这要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爆发的新疆伊犁“三区革命”。1946 年，伊犁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决定，锡伯族要发行自己的报纸。这样，锡伯族就面临着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即对自己保留下来的语言文字，继续称满语满文呢，还是改其称呼？后经锡伯族有关人士商讨决定：就满族整个民族而言，朝廷从嘉庆道光后就逐渐不用或少用满语满文了，满族从朝廷官员到普通百姓整体开始汉语化了，辛亥革命后，满族的地位骤变，许多人隐姓埋名，改成汉族，整体改用了汉语汉文，只有锡伯族把满文保留下来沿用至今，并且作为自己的语言文字一直在使用着，所以没有再称满文的必要了，不如改称为锡伯文。从此，开始有了锡伯文一说。

1947 年，在伊犁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所在地伊宁市成立了“锡伯索伦文化协会”（简称“锡索协会”），吴扎拉·萨拉春等老一辈学者总结锡伯族长期使用满文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现行满文作了某些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废除了 13 个没有实际意义和用处的字母 ā、bū-、pū、sū、šū、lū、mū、cū、jū、yū、rū、fū、nū；二、增制了 wi、wo、wu 三个形体字母；三、改进了个别字的书写规则。通过这次改革，这种改进了的满文就名副其实地成为锡伯文了。

评价这次改革的历史功过，笔者认为，是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对锡伯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绩是主要的，它早已得到

锡伯族人民的承认。

首先，废除的13个字母，在满语中没有具体、明确、严格的用处。在满族人编纂的各类工具书，名目繁多的各种书籍中，基本没有出现其中的12个字母，只有长元音 \bar{a} 经常出现。但从语音学上来讲， u 元音已经有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留一个长元音 \bar{a} ，因而改革者们把长元音 \bar{a} 废除了，保留了 $k\bar{u}$ 、 $g\bar{u}$ 、 $h\bar{u}$ 三个字母。

其次，增制的 wi 、 wo 、 wu 三个字母，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来讲，都是合理的，是完全必要的。纵观满文字母创制的规律，一般是以元音 a 、 e 、 i 、 o 、 u 、 u 为一组，与辅音拼写创制形体字母。如： na 、 ne 、 ni 、 no 、 nu 、 $n\bar{u}$ ； ma 、 me 、 mi 、 mo 、 mu 、 $m\bar{u}$ ； la 、 le 、 li 、 lo 、 lu 、 $l\bar{u}$ 等等，惟独到辅音 w ，只有和元音 a 、 e 拼写就止步了，所以延续 i 、 o 、 u 创制 wi 、 wo 、 wu 三个字母是合理的。既已废除长元音 \bar{a} ，就不可能再创制 $w\bar{a}$ 字母了。从实际生活来讲，在满语锡伯语中存在 wi 、 wo 、 wu 这个音。例如：“ $iwim$ ”（玩耍），令牛停步时喊“ wo 、 $wo!$ ”、“ $uwu!$ ”（下来！）等。另一方面锡伯族到伊犁后，有了同俄罗斯人的交往，尤其是20世纪初开始，留学于俄国的锡伯族知识分子，把大量的俄罗斯和欧美的文学作品译成满文，介绍到锡伯族人民中来了，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地名有许多 wi 、 wo 、 wu 等音，现有的满文中又无可代替的字母，若无 wi 、 wo 、 wu 等字母，就无法准确翻译。所以，创制这三个字母已经势在必行了。

再次，改进个别字的书写规则也是可行的。这主要是从便于学习、便于书写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满文辅音字 f 与元音 a 、 e 拼写时，写法是出头，而与元音 i 、 o 、 u 拼写时则不出头，写法不一律。现因增加了 wi 、 wo 、 wu 三个字母，为了区别辅音 f 和 w ，改为辅音 f 与元音拼写时一律出头，而辅音 w 与元音拼写时则一律不出头。此外，满文出现在音节末的小舌音 k 和舌根音 k 在形体上有区别，但在书写时又可相互代替，没有严格界限，完全沿用蒙古文的。从语音学上讲，满语中的小舌音 k 和舌根音 k 在发音上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必要搞成两个字。再者，在满文的草书中，一般没有齿牙，音节末的 ng 字和 ek 字，在正规书写时， ng 字带一个齿牙， ek 字没有齿牙，形体特征一样。但在草书中，因没有齿牙，所以 ng 字和 ek 字一样，很难辨认。根据上述情况，在这次改革中，把小舌音 k 和舌根音 k 一律书写成小舌音 k 的形体，并且把小舌音的字形从两个齿牙左边带两点改为一个齿牙左边带两点。当然，其中也包含与蒙古文加以区别的意义。

这次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波及的面也是很广的，不但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而且也规范了许多新名词概念。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词汇。根据满语锡伯语构词法特点，适应当时的历史潮流，研究新概念、新名词，创造了像 $dashalan$ （革命）、 $deyetun$ （飞机）、 $\check{s}ungitun$ （机器）、 $kumdusdun$ （空气）、 $bodocin$ （算术）、 $\check{s}uturu$ （文法、语法）、 $niamanga gisun$ （语文）、 $jucun$ （话剧）等等许多新词汇，丰富了锡伯语。这一时期，还开始用科学的语言学规律规范满语锡伯语，吴扎拉·萨拉春用锡伯文编撰了《锡伯语语法》，创造了新的语法术语，如 $gebsun$ （名词）、 $a\check{s}\check{s}asun$ （动词）、 $arbusun$ （形容词）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伊犁锡伯文是满文的袭用，而不是一个成为独立体系的文字。因为满语锡伯语属同一语系同一语族同一语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所以，锡伯文从本质上说就是满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会了锡伯文，就学会了满文，学会了锡伯语，就学会了满语。这种文字所经历的历史演变过程是：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老满文——新满文——锡伯文。

第二，锡伯文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满文了，是改革了的满文，是满文的继续和发展。

第三，锡伯文虽然从本质上说就是满文，但是锡伯族人民和国家已经认可为锡伯文了，是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文字，是锡伯族自己的文字，我们应当继续学习、研究和发展它。

注释：

《金史》，卷73。

《华夷译语》，汉文非汉文对照的词汇、公文汇编总计。共四种版本。三种成书于明代，一种成书于清代。

《清史稿》，卷24。“巴克什”，蒙语 $bak\check{s}i$ ，先生、教师，相当于古汉语的“博士”；“扎尔固齐”，蒙语、满语同音同义词 $jarguci$ ，官衔，法官、审判官。

《清史稿》，太宗实录。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5。

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之一：《锡伯族简史》第98页。

转译于安俊、吴元丰、赵志强所著锡伯文《锡伯族简史》第486—487页。

【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张建国】